

# 学“毛著”运动中的乡村基层政治精英\*

——以山西省阳城县为中心

吴家虎

[摘要]目前关于学“毛著”运动的研究偏重于“自上而下”式的传统政治史视角,忽视了“群众”在运动中的独特心态、行为和风貌及其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基于新发掘的山西省阳城县下孔大队档案资料,对运动中乡村基层政治精英的心态与行为作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社会主义乡村在文化重塑与转型中国家“文化权力”治理之机制、功效及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乡村政治精英;农民心态;阳城县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1-0028-09

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以下视角展开叙述和分析:从全国或某些省份的宏观视角来叙述和分析运动的发展过程、特点及影响,总结其经验教训;从共青团等组织系统的角度叙述这一运动;从重要政治人物的角度叙述和分析其提倡学“毛著”的动机、思想和主张。<sup>①</sup>这些成果在研究视角和内容上属于“自上而下”式的传统政治史范畴,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这一运动。但是,无助于揭示运动的复杂面相和丰富内涵。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一运动的研究在叙事视角与研究方法上更加贴近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显示出新的研究动向<sup>②</sup>。笔者认为,用“至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和区域史的研究方法,充分发掘利用基层档案资料和调查访谈的口述资料,对学“毛著”运动中普通民众的心态与行为进行深入的考察,不仅对深化学“毛著”运动的研究,而且对毛泽东时代大众心态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笔者在华北乡村调查研究中新发掘的山西省阳城县下孔大队档案为开展这项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sup>③</sup>。笔者将利用这批档案,从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视角切入,对学“毛著”运动中的农民心态与行为展开深入的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认为,文化是共享的,但文化内部又具有差异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当代华北乡村文献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编号:10BZS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许新年《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述评》,《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杨建:《一段难以忘却的历史——当年广东开展的学“毛著”运动》,《广东党史》2008年第6期;李相久、李英等主编《当代中国青年运动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146页;杨林生《论罗荣桓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与林彪的分歧与斗争》,《南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黄瑶《林彪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所为何事》,《党史博览》2009年第12期。

② [美]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135页。

③ 2009年夏,笔者在阳城县开展建国后乡村基层档案文献资料的调查工作,于下孔村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丰富珍贵的档案文献资料。这批资料按存所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村委会档案室所存档案文书和保管室所存1980年以前的档案。档案室所存档案已系统整理并归档,分为“党”字(党支部档案)、“政”字(主要是革委会档案,包括此前的管委会档案)、“专”字“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档案、“资”字(上级文件资料)四类档案。保管室所存档案封存于5口大木箱,未经整理,且保存条件堪忧。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下孔村于2009年9月达成协议,将这批资料运抵该中心进行整理和数字化保存,整理完成后原档案归还下孔村。整理后的保管室档案按大写英文字母分为A至J共10大类,本文所用的E、F类主要包括大队干部的工作日记、会议记录,以及“四清”运动的资料。文中凡未注明藏所的未刊资料,均出自下孔大队档案,不再一一注明。

性,其原因在于特定文化中必定存在着诸如性别、年龄、亚群体等文化变量<sup>①</sup>。从这一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来看,我们在研究农民文化时,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同质性的整体加以描述,而应同时关注其共享性与差异性,深入考察农民文化内部存在的各种文化变量,力图更细致地分析农民文化内部存在的差异性,以此来展现其复杂面貌,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农民生活世界。基于这一研究思路,笔者以政治身份为标准,将学“毛著”运动中的时代农民划分为基层政治精英和普通农民两大群体,从亚群体的角度对农民心态与行为展开叙述和分析。<sup>②</sup>限于文章篇幅,普通农民群体的心态与行为将另文加以探讨。

## 一、学用在先:干部带头的动员与示范

基层党员、干部是农村权力结构的核心。在以政治为中心的时代,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对群众有巨大的影响与示范作用。学“毛著”运动开展的初期动员阶段,也主要是靠基层党员、干部的带动;运动能够长期深入开展,也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身体力行的示范。

1963年冬,阳城县北留公社大树大队党支部根据县委指示,开始组织全体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并逐步建立健全了学习制度。同时,党员以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去影响群众、教育群众,帮助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动学“毛著”运动由党内向群众发展。例如,第一生产队队长张某一次和社员担着茅粪往地里送,路上碰到一堆稀牛粪,他就放下担子,用手把粪抓到粪桶里。社员们看到他这种行为说“某某比过去给自己种地还下劲!”他说“现在的地也是给自己种。为革命就得下个劲,这个劲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出来的,大家要有我这个劲,也得好好地学‘毛著’。”<sup>③</sup>西沟公社北任大队民兵连作为阳城县学“毛著”运动中民兵系统的先进单位之一,他们的经验之一就是“连排干部带头学,带头讲,带头用,开门革命”。民兵连指导员田某汇报说,1966年5月、8月两次开门革命,全连民兵给16个连排干部提了200多条批评意见,仅给他就提了36条。民兵张某的批评最尖锐,他说“田某是马列主义口朝外,手电筒照人不照己。作风生硬,个人意见第一,真是自由主义。”<sup>④</sup>这种干部带头,将干部置于群众批评监督之下的开展运动的方法,无疑使运动更具说服力与号召力。

1968年7月底,阳城县组织了县、社、队三级领导和县驻点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sup>⑤</sup>负责人参观、学习、研究会议,集中研究和讨论了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问题,也就是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问题。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领导班子革命化的重要性。会议强调,我们在工作中深深体会到:领导本身不革命化,一切难说话;领导本身不过硬,一切难行动。我们县群众有句俗话说叫做: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这也说明领导班子革命化的重要性。最近,学“毛著”办公室对几个公社办学习班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院、户学习班办得不好,流于形式,问题就在于领导班子不革命化,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带头办好自己院、户的学习班。因此我们说,解决领导班子革命化的问题,已经成为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当务之急,成了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了。怎样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呢?会议综合

<sup>①</sup> Haviland, William A. Cultural anthropology, 10th ed. Fort Worth: Harcourt College 2002, p34-35.

<sup>②</sup>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笔者以政治身份标准划分农民群体即是基于此种考虑。本文使用的乡村基层概念指人民公社以下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乡村基层政治精英就是包括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各类权力组织的党员、干部构成的群体。

<sup>③</sup> 北留公社大树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山《三项制度是法宝,三大作风离不了》,《阳城小报》1966年3月23日第3版,F-17,未编页码。

<sup>④</sup> 西沟公社北任大队民兵连指导员田某《是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连民兵的心》,第48页。

<sup>⑤</sup> 笔者注,蹲点取经,培养典型,以点带面,是毛泽东时代普遍倡导与实践的一种工作方法。

这次参观学习先进单位的经验,提出以下几点意见:第一,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带头学,带头用,带头干。如果我们领导班子学不好,就没有办法,也没有资格领导群众学好毛主席著作。第二,要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实现组织革命化。孔池大队通过落实毛主席精兵简政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大有改善。大队干部经常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斗私批修,不仅密切了干群关系,取消了补贴工,而且还加强了领导班子革命化。<sup>①</sup>

町店公社中玉大队参观了秦庄、孔池等先进单位后,立即组织大小队干部、党团员80余人进行了讨论,作出了领导干部“七带头”的决定,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带头,斗私批修带头,大批判带头,忆苦思甜带头,干重活带头,干脏活带头,干关键活带头。革委会副主任白某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这一教导,和群众同甘共苦,特别是在“三抢”运动中,担不离膀。有一天,三队在石井圪垯点种。这地原来每晌只能担10趟水,天已中午了,趟数也担够了,但还有五分地的种未点起。为了争取玉米下种时间,他带领社员学习了毛主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这一教导,给群众带来了精神食粮。队长白某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歌担上水就走。在他们的带领下,每人又担了7趟,胜利完成了任务。由于干部参加了集体劳动,抓住了活思想,第三队的玉米点种8天就完成了任务,为全大队树立了榜样,使全大队的300亩玉米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了任务。<sup>②</sup>

1969年8月22日,阳城县召开为期8天的全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总结认为,“领导带头,学用在先”是我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一个新局面的显著特点之一。由于领导带头,学用在先,这就使我县过去长期存在的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局面,已经或正在开始改变。许多领导同志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学在前,用在前,才能取得领导权。”人参垌大队贫协主任王某、苏村大队革委主任侯某、南梁大队生产队长阎某等都登上了讲台,带头讲用,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sup>③</sup>

干部带头的动员与示范,既是学“毛著”运动在乡村基层社会长期深入开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其关键所在。因此,通过学“毛著”运动向基层社会输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再是一套抽象的观念体系和空洞的说教,而是在基层政治精英身上直观地形象地富有说服力地展现了出来,这更有利于有效地动员普通农民认识、接纳与实践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二、“公”“私”之间:个人利益理性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

学“毛著”运动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塑造一种具有完全彻底的“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因此,“大公有私”论、“公私溶化”论自然作为“中国赫鲁晓夫”的流毒大加批判,成为每个人在灵魂深处狠斗“私”字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一超越历史发展条件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彻底“革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与民众个人利益理性的深刻的内在冲突之中。在乡村基层政治精英这一特定群体身上,这种冲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根据冲突表现的剧烈程度,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sup>①</sup> 《狠抓领导班子革命化,把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伟大群众运动进一步推向新高潮——李维彬同志八月一日在全县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观、学习、研究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摘要)》,中共阳城县核心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办公室《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第23期,1968年8月6日,“资”字1968-3-11,第131~132页。

<sup>②</sup> 町店公社中玉大队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越办越好,干群的思想革命化越来越高》,1968年10月21日,“党”字1966-1-8,第44~45页。

<sup>③</sup> 阳城县革委会副主任孙文龙《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阳城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文件》,1969年8月29日,“政”字1969-1-7,第18页。

第一种是个人利益理性的自我检讨与规训。这种冲突表现得比较温和。在运动中,乡村基层政治精英能够自我检讨与批判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和行为,并努力去迎合与超越。1963年冬,北留公社大树大队党支部就开始组织全体党员学“毛著”。党员张某经过学习《为人民服务》后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说“过去我领导全队的副业生产,不是按毛主席教导的‘我们的革命队伍完全是为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这个观点出发,而是搞副业对自己活便些,出力不大工分不少,所以工作责任心不强。去年两个月油坊加工七千多斤油籽,因操作得不好,少出油68斤。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切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此他的思想变了,干劲也大了。过去说得多,现在干得多。从1965年11月开始,他从早到晚和副业人员一块劳动,一块工作,多种经营的收入有了显著增加。<sup>①</sup>

1968年9月8日,町店公社下孔大队召开了有革委、队务委员、民兵排长、党小组等共35人参加的学“毛著”讲用会。以下是会上的一些讲用发言,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冲突在基层政治精英身上的种种表现与自我规训:<sup>②</sup>

张某讲:当了三年队务委员,思想不好,原因是不如副业上,能仗(挣)点钱,光想多挣工分。不关心群众生活,把洋谷捂了。学了斗私批修以后,感到不合理,要为人民服务,干一辈子革命。通过学习,一定要听党的话,指到哪里干到哪里。

张某(女)讲:有一次在生产队劳动,在地里拔了一堆草,准备拿回去喂猪。后来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把自己的草给队里的牲口吃了。又有好几次,快到晌午了,社员都想回。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又带头把社员留住,总想多劳动点,这都是学“毛著”后的感想。

第二种是个人利益理性的消极反抗与规训。毛泽东时代的乡村基层干部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虽然比普通群众拥有引以为豪的政治身份和荣耀,但经济条件与普通群众相比并没有特别的优越地位。恰恰相反,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还需要更多的无偿付出,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政治风险。从“四清”到“文革”这一系列愈益猛烈的政治运动,针对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干部的特殊化、官僚化。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干部应该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当老爷,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sup>③</sup>因此,从利益理性出发考虑,不少基层干部自然产生了“当干部吃亏”的思想。当时阳城县流传着“当干部不够本,六多五少是结论”的说法。所谓的“六多”指“误工多、熬眼多、跑腿多、受气多、受累多、运动来了挨整多”,“五少”指“送工少、收入少、分粮少、关心家务少、亲戚门上走得少”。<sup>④</sup>这种“当干部吃亏”的思想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消极反抗,躺倒不干,不愿当干部。河北公社南梁大队阎某细致地讲述了自己不愿当队长的心理:1966年2月,大队分配我到水利队当队长。当时我想,过去我也干过一段生产队长,知道当队长的难处。当队长有“四多一少”(开会多、吃苦多、惹人多、误工多、挣工少)。因此不愿当队长,只想找个单人独业、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的工作去干。恰好有一天,我听说大队要从各生产队往水利队抽调牲口。这时我想,喂牲口这活倒不错,一是自由自在,还能不受别人的气;二是不管天阴下雨都有工分;三是自己使用方便;再说多吃些饲料,旁人也不会知道,大有便宜可讨。于是我就向大队干部主动提出想去喂牲口的要求。经过大队集体研究,

<sup>①</sup> 北留公社大树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山《三项制度是法宝,三大作风离不了》F-17,未编页码。

<sup>②</sup> 《大队召开讲用会》,1968年9月8日,《“老三篇”笔记本:下孔大队革委会会议纪要》E-8,第6~8页。

<sup>③</sup>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红旗》1964年第13期,第31页。

<sup>④</sup> 芹池公社阳陵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郭某《我们大队领导班子是如何带领群众办好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中共阳城县核心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办公室《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第30期),1968年9月19日,“资”字1968-3-11,第139页。

批准了我。目的达到了,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sup>①</sup>

1968年1月,中共町店公社核心小组、町店公社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用毛泽东思想促进干部、社员的思想革命化。干部、社员在学习班上要以“老三篇”为武器,以斗私批修为纲,猛攻自己头脑里的私有观念,坚决摧垮头脑里“私”字的根基,筑起“公”字的长城。不少干部存在着“当干部吃亏”的思想。在学习班上,就带着“当干部是不是吃亏”的问题学习“老三篇”。干部、社员要以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以老愚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决心,作为镜子检查批判自己的私心杂念,树立起“为革命种田”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sup>②</sup>

乡村基层政治精英中“当干部吃亏”的思想和消极反抗是比较普遍的。在芹池公社阳陵大队,全大队11个生产队中,就有7个队长、5个会计申请不干。大队只得连续举办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彻底批判“当干部吃亏”论这一“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树立一切为人民,一切为革命,永远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通过办学习班,斗私批修,不仅原来躺倒不干的干部都干起来了,工作不力的都积极地挑起了革命重担,而且大、小队两级领导干部都表示不要补贴工了,并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改善了干群关系。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某在抗旱中和群众在一起劳动,带头下水挖渠,中午不休息坚持干,扩大了保浇面积。民兵教导员李某带领30多个民兵在后河开一条水渠。原计划3天完成任务,在他以身作则带头实干下,经过一天一夜奋战就完成了任务。<sup>③</sup>

基层政治精英在学“毛著”运动中处处带头的表率要求与其现实处境的巨大反差,构成了个人利益理性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深刻的内在冲突。学“毛著”运动是在化解与克服这一冲突的过程中艰难维持与推进的。这一冲突决定了学“毛著”运动及其输入乡村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耗尽其政治动员声势与热情之后的命运。

### 三、忆苦思甜与阶级情感:政治热情的激发

在“土改”实践中,中共发明了“访贫问苦”、“倒苦水”、“挖穷根”等办法,以激发农民的痛苦回忆,发现痛苦根源,从而将农民的个体疾苦上升为阶级苦、阶级仇,强化革命意识形态,掀起革命的风暴<sup>④</sup>。在学“毛著”运动中,中共承袭了这一政治动员方式与资源。忆苦思甜,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学,成为学“毛著”运动成功开展的重要经验之一。这一助燃运动的政治热情与阶级情感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忆苦思甜激发的感恩心态与政治热情。一些基层政治精英在中共主导的社会变革中成为受益者,因此,对比今夕的处境,忆苦思甜,他们常怀着自发的感恩心态,积极响应党的各项号召,包括学“毛著”这样的运动。例如,润城公社河头大队的大队长张某,解放前父母从河南乞讨流浪到此,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全家6口人,身居沁河岸边的寒窑,以扛长工度日。解放后他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入了党,当上了干部,深知共产党、毛主席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党号召学习“毛选”,他

<sup>①</sup> 《“老三篇”照红我的心,为革命当好饲养员——河北公社南梁大队饲养员阎某在全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经验交流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共阳城县核心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办公室《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第16期),1968年7月12日,“资”字1968-3-11,第115页。

<sup>②</sup> 中共町店公社核心小组、町店公社革委会《关于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1968年1月8日,“党”字1969-1-9,第60页。

<sup>③</sup> 芹池公社阳陵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郭某《我们大队领导班子是如何带领群众办好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第139页。

<sup>④</sup> 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81页。

首先积极响应。自己一字不识,就想办法,除积极要求支部组织学,坚持集体学习外,还叫女儿给他读,进行自学。经过努力,他共学习了11篇主席著作,学会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懂得了如何为人民服务,怎样关心群众生活,发现和解决了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很受群众爱戴,成为群众的“贴心人”。<sup>①</sup>

第二种是翻身忘本与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一些乡村基层政治精英在中共主导的社会变革中翻了身,却开始沉迷于较过去更为优越的生活,不愿继续响应党的号召,走在革命的前列了。学“毛著”运动中,通过忆苦思甜对其进行阶级教育,使其重新燃起革命热情。町店公社中玉大队,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一些老干部不愿继续挑革命的重担。大队在举办的干部学习班上,就带着不懂得掌权用权的活思想,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情感教育。革委会主任赵某忆苦说:“在旧社会,我几岁就给地主扛长工,吃的是剩米饭,睡的是牛棚,穿的是破烂衣,做的是牛马活,全家少吃无穿。在那黑暗的旧社会,我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折磨。解放后,搞了土地改革,党使我家翻了身。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又入了党。家庭生活富裕了,我的思想也变了,怕吃苦,怕挨整,一心当个好好人,就借口年纪大没文化不干革命。所以在‘三结合’班子分工时,我一直不担第一把手的重担。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我想通了。我是贫下中农的后代,要忠于毛主席,掌好无产阶级的印把子,干一辈子革命。”现在他挑起了革委会主任这副重担,当了群众的好领班。<sup>②</sup>

忆苦思甜和阶级情感教育固然可以激发起乡村基层政治精英的一些政治热情,但这一苦根甜源的切身记忆并不具有遗传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党最忠诚的“土改”一代农民渐次退出历史舞台,由“老贫农”向“青年干部”的代际忆苦思甜,自然与历史变革当事人的忆苦思甜有质的区别。时过境迁,这一政治动员方式与资源正慢慢耗尽其效力。

#### 四、政治思想挂帅“有形”与“无形”之间

学“毛著”运动兴起并成为群众广泛参与、历时弥久的政治运动,最根本的动因在于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治国方略与社会主义模式。但是,当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国家意识形态向乡村社会推行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误解与阻力。

传统的小农是现实的。他们易于接受的是“土改”那样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利益的政治运动。像大学“毛著”、政治思想挂帅这样的运动,他们自然会感到隔膜。学“毛著”运动开展的初期,一些人就认为,生产是“硬头货”,完不成难过关;政治是“无形的东西”,既不能斗量,又不能秤称,搞好搞坏“都有含糊”。“政治不产粮食,思想不能当饭吃”。“只要粮食打得多,何愁他们不来总结经验”。“突出政治”就是“突击政治”,像突击生产一样大搞一下。这便成为国家推动学“毛著”运动在乡村基层社会深入开展首先要着力解决的重要思想认识问题,尤其是领导运动的基层政治精英。1965年5月底,中共阳城县委在润城公社河头大队召开了突出政治大学“毛著”现场会议,由县委副书记郭藏柱亲自主持,首先讨论解决的就是这一问题。<sup>③</sup>

笔者在原町店公社下孔大队调查访谈时,当年的民兵营长给笔者讲述了他对政治思想挂帅的记忆与认识。从中可以看出,还是“有形的东西”让人们记忆更加深刻。“民兵学‘毛著’后头(后来)就没有。咱这是过了事就忘了,过了事就不考虑这些。那会间(那时候)开会前先唱《大海航行

<sup>①</sup> 中共阳城县委《关于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河头现场会议总结报告》,中共阳城县委文件(65)49号,1965年6月5日,“党”字1965-1-6,第6~7页。

<sup>②</sup> 町店公社中玉大队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越办越好,干部的思想革命化越来越高》,第42页。

<sup>③</sup> 中共阳城县委《关于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河头现场会议总结报告》,第5~6页。

靠舵手》唱完才坐下开会,开完会还要唱这歌,唱完散会。那会间民兵主要是抓了个比武、打坝,旁的(别的)看不见。比武打靶,奖励子弹,熬(那)是现实的,这一样你就圪戳(哄骗)不过。除此之外就是抓生产,塞沟垫地,那时候光这塞沟垫地就把人努(累)死了。”<sup>①</sup>

这种政治思想挂帅,大学“毛著”搞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农村政治思想工作模式在实际工作中并非毫无成效。处在海拔千米的高寒山区,全年无霜期只有150天的润城公社大安头大队,1966年棉花亩产102斤,1967年计划指标是120斤。对于这个增产幅度,有的人怀疑,有的人畏惧,说“低产地区可以大幅度增产,高产地区就不能够大幅度增产。咱这高寒山区,亩产102斤就顶天了,还想一下增产20%,简直是做梦也碰不到这样的好事。”但是,不论有多大的议论和责难,大队“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思想却毫不动摇。他们坚信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威力,首先组织大、小队干部和革命派头头反复学习和钻研毛主席“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伟大教导,并组织干部和政治工作员深入群众当中,积极热情地宣传这一最高指示。在这个基础上,联系实际地总结了第一生产队1966年3亩棉花亩产170斤的经验。这样,他们以毛主席最高指示为纲,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总结经验,自己教育自己,有效地解决了“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树立了夺取棉花高产的信心。人们的抵触思想解决后,他们又把学“毛著”先进分子选进棉花专业队。这支专业队坚持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实行“四带”(上地带宝书、带毛主席语录牌、带毛主席像、带红旗、“三到田”(学习毛主席著作到田、开讲用会到田、表扬好人好事到田),把第一队3亩棉田的增产措施用到大田,时时、事事以“完全、彻底”、“两个极端”和“精益求精”这三把尺子严格操作,最终夺得了大丰收。<sup>②</sup>1967年大安头大队棉花亩产140多斤,远超过原计划120斤的指标。1968年在大旱的情况下也达到了110斤,仍是全县第一。阳城县革委会为了使全县棉花生产战线摆正思想和技术这种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几次共组织2300余人到大安头参观。参观后大家说,那里是“红太阳照亮了可乐山,毛泽东思想金光闪;白土料疆土质差,海拔千米气候寒;只因思想革命化,棉花六年翻七翻。”县革委会认为,大安头棉花高产的原因就是一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实现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凡是去大安头参观了的人都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把思想放在第一位,技术放在第二位,主要是搞人的思想革命化,以思想统帅技术。<sup>③</sup>40余年后的今天,大安头村一些老人还记得,他们在老支书李引宽的带领下,生产搞得红红火火,“棉花结得白又大,粮食堆得比山高”。而老支书两次受到周总理接见,更是大安头村人引以为豪的美谈。<sup>④</sup>

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国家意识形态,本质上延续着传统儒家道德圣化治世的理想。如果超越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终究也只能是一种共产主义道德的乌托邦,难以得到普遍的实现和持久的维系。因为,不管政治运动的声势有多么浩大,不管国家权力的动员能力有多么强大,不管领袖的权威和魅力有多大,要使多数农民都具有共产主义道德,时时、处处、事事以“完全、彻底”、“两个极端”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奉献社会主义事业,结果仍只能是一种革命理想燃尽后的退潮,理想道德的破灭。

<sup>①</sup> 访谈记录:JBT2012-18(笔者注,访谈资料的注释体例,大写英文字母代表访谈对象的姓名缩写,其后的数字分别代表访谈年份和该年的访谈记录整理编号)。

<sup>②</sup> 《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统帅棉花生产,阳城县一九六七年棉花空前大丰收》,1968年2月22日,“资”字1968-2-10,第1~2页。

<sup>③</sup> 阳城县革委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胜利——阳城县一九六八年棉花生产总结》,1969年1月18日,“资”字1968-2-10,第12页。

<sup>④</sup> 郭建光《沉陷的村庄》,《中国青年报》2007年5月16日,中青在线,http://zqb.cyol.com/content/2007-05/16/content\_1760886.html。

## 五、国家意识形态下移与基层政治精英接纳素质的困境

学“毛著”运动开展的初期一些人就认为,毛主席著作只能机关干部学,农民不能学;只能有文化的人学,不识字的人不能学;只能青年人学,老年人不能学;只能农闲时学,农忙时不能学。这种观点不仅在乡村基层政治精英中存在,对他们也不无影响。因为,建国后在基层权力结构中兴起的新政治精英,大多出身于贫下中农,文化素养普遍较低。由他们带领群众学“毛著”,不免有心理上的障碍与实际的困难。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力图通过一些典型经验使人们相信“毛主席著作谁都可以学习,同时一学就灵,一抓就见效”。<sup>①</sup>

1966年7月,町店公社下孔大队党支部书记苏某在一篇汇报材料中叙述了自己学“毛著”抓思想改进工作的经历,鲜明地反映了学“毛著”给一个文化低、资历浅的年轻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带来的影响:1966年元月,因工作需要,我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看来这是一件好事情。但初接工作后,思想里产生了种种顾虑,总感到自己的文化太低,还不及个初小程度,看信看报还得请人。……于是就想打个退堂鼓,请示领导自己不干了。虽经过公社李书记的说服教育,但实际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告诉我干革命要经过思想斗争,要多读毛主席著作。后来我听了他的话,回忆自己出身贫农家庭,党亲手把自己培养成人,在学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后,真对自己来说有所提高、有所帮助。回想白求恩同志是一个外国人,人家能来到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自己是个青年,遇到困难就退缩,怎能谈得到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又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于是自己就下定决心,鼓起勇气干工作,见(只要)遇到困难就学习毛主席著作。<sup>②</sup>

学“毛著”运动初期主要是学“语录”和“老三篇”,尚比较简单,后来则进一步深入发展为学哲学。1971年8月底,阳城县召开了全县各条战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会议认为,阳城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伟大群众运动出现了新局面,新水平,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积极响应九届二中全会发出的伟大号召,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掀起了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使哲学变成了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和科学化。白桑大队决定从三里外的西玉沟引一股每分钟只有65市斤流量的小水来浇地。有些人认为引这股水油水不大,说“一颗芝麻榨不出多少油,一滴水成不了大气候”。大队党支部就引导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小和大,多和少,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小是大的前提,大是小的集中,积少可以成多,滴水可以成河。只要把一滴水平时蓄起来,认真管起来,充分用起来,小水能成大气候,一滴水能做出大文章。就这样,他们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用一滴水发展了三百多亩水浇地。去年,粮棉一跃双上“纲”,今年可望过“黄河”,成为山西省山区发展小型水利的先进典型。<sup>③</sup>

学“毛著”运动是在“三十字学习方针”的指导下开展的。这一方针强调“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因此更突出了践行而不是对理论本身的学习。<sup>④</sup>这一实践性既是学“毛著”运动在

① 中共阳城县委《关于突出政治学毛主席著作河头现场会议总结报告》,第7页。

② 下孔大队党支部书记苏某《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搞工作——谈我学“毛著”抓思想改进工作的几点做法》,1966年7月21日,F-11,第1~2页。

③ 中共阳城县委《关于召开各条战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的情况报告》,中共阳城县委文件阳发(1971)第62号,1971年9月12日,“党”字1971-1-12,第6~10页。

④ 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1966年12月16日,《红旗》1967年第1期,第3页。



基层社会开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也部分地弥补了基层政治精英接纳素质的困境。学“毛著”运动既是在政治运动威势的场景中展开的,又成为文化层次普遍较低的乡村基层政治精英获取工作勇气、工作方法和人生价值观的源泉。

## 六、余论:文化权力及其治理功效

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其20世纪前半期的华北农村研究中深刻地揭示了“国家政权建设”与“文化网络”之间的密切关系<sup>①</sup>。在笔者看来,20世纪50~70年代的华北乡村,仍清晰地延续与展现了这一历史发展脉络。这一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力”治理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并转而逐步将其彻底变革乡村社会的努力推进到“文化权力”这一深层社会空间。学“毛著”作为一场声势浩大而又持续弥久的政治运动,即是这一努力的典型体现。这实质是一场国家动员的有广大农民广泛参与的文化重塑与转型。

国家“文化权力”的治理功效如何呢?本文通过对基层政治精英这一乡村社会核心群体的心态与行为的深入考察,可以看出这一“文化权力”的治理机制及其实践既取得了一些成效,又面临着诸多深刻的内在困境。这一“文化权力”的治理本质上延续着传统儒家道德圣化治世的理想,它既需要对人情人性的某种程度的超越,又需要因人情人性,在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在那个时代的实践中其承载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却过于曲高和寡,终究陷入了与个人利益理性之间深刻的内在冲突之中,而从根本上注定了其最终的命运。乡村基层政治精英代际结构的逐步转型和接纳素质的困境,以及现实的小农对政治思想挂帅这一社会主义模式的隔膜,也是影响这一“文化权力”治理功效的重要因素。在诸多的困境与张力中,政治运动的威势和干部带头的动员与示范,成为这一“文化权力”的治理机制得以在较长时期内维系的关键所在。本文所揭示的社会主义乡村在文化重塑与转型中国家“文化权力”治理之机制、功效及面临的困境,不仅可以解释改革开放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基层社会迅速崩解的深层根源,而且对今天总结其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普及化实践化,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 西安外国语大学思政部讲师 陕西 710128)

[责任编辑:江俊伟]

<sup>①</sup>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